

用激情讴歌时代 以精品奉献人民

济南大学政法学院名誉院长、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 包心鉴



习近平总书记3月4日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的重要讲话,进一步阐明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重要地位和特殊功能,进一步指明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肩负的责任和前进的方向。“讲话”言简意赅、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寓意深长,是继2016年“5·17”重要讲话之后关于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又一纲领性文献。“讲话”尤其强调,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这一精辟论述和明确要求,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政治导向性,是哲学社会科学界各领域各学科的共同任务,是一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根本遵循。深入学习这一重要讲话,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身处新时代、肩负新使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有责任到时代大潮中“中流击水”,用精品力作“指点江山”,为深入研究新时代、热情讴歌新时代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第一,树立强烈的时代意识和使命意识,以服务新时代伟大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为己任。

古往今来,一切有识之士、有志之士,都不胸怀一种社会责任感和强烈使命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中华民族知识分子这种使命意识和价值追求,对于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仍然具有强烈的震撼意义和激励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是一个催人奋进的时代,也是有利于哲学社会科学大繁荣大发展的时代。新时代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新时代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锻造思想,新时代需要学术而且一定能够繁荣学术。

习近平总书记在“3·4”讲话中要求,“希望大家承担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勇于回答时代课题,从当代中国的

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的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对于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深入研究新时代、科学阐发新时代,从学理高度深入揭示新时代的本质特征和内在逻辑,深入探究“新时代”与“新思想”的内在联系,尤其深刻讲清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时代价值,为新时代新征程新发展提供有深度、有高度、有价值的理论研究成果,具有更加特殊的责任与意义。这也是检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是否有信仰、有情怀、有责任、有担当的一个重要标志。置身于新时代伟大社会变革中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不辱时代使命,不负人民期望,继承优良传统,树立高远志向,用自己的勤奋努力和研究成果为新时代“立心”,为中国人民“立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太平”。

第二,树立厚重的问题意识和为民意识,以研究重大现实问题、服务人民需求为中心。

马克思说,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时代的声音。习近平说,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泉。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对象,问题也是人民的诉求、是人民的呼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密切关注人民群众在追求美好生活和推进社会进步中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是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攻方向;树立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增强捕捉问题、分析问题、回答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水平和能力,是一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备的基本功。这个“问题”,不是狭义的问题,而是广义的问题;不是伪问题,而是真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大问题。真正的问题不是来自于书斋,而是来自于社会,不是脱离实际的苦思冥想、矫揉造作,而是对人民群众安危冷暖、喜怒哀乐的深切关怀和悉心体悟。习近平总书记在“3·4”讲话中明确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解疑释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我们只有时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切关注人民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透

过问题现象探求事物本质,才能获得真知灼见,才能有有用的研究成果、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出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研究成果。

社会实践无止境,人民需求无止境,问题研究也无无止境。这正是实践之树长青、理论之树也长青的根本所在。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时期,这是一个既面临重大机遇又面临重大风险和挑战的重要时期,是一个“船到中流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重要时期。在如此重要而特殊的发展时期,有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亟待我们去深入研究,并运用新时代新思想新语言新方法加以科学阐释,由此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创新。比如,中国道路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问题,中国制度的“创新性”与“定型化”相统一的问题,中国文化的“传统之根”与“先进之魂”相统一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逻辑”与“政治逻辑”相统一的问题,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民主生长”与“权力制约”相统一的问题,如此等等,都是伟大时代和人民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3·4”讲话中特别指出:“要深刻解读新中国70年历史性变革中所蕴藏的内在逻辑,讲清楚历史性成就背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更好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强大精神激励。”这是当前哲学社会科学亟待深入关注的时代大课题。“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肩负时代重托和人民期待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有责任在深入研究和回答重大现实问题中向时代和人民交出优质答卷。

第三,树立一流的精品意识和学术意识,以增强学术积累和创新功力、拿出具有自主性和独创性的精品力作作为追求。

一段时期,哲学社会科学界学术浮躁之风日盛,一些理论工作者追名逐利、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种种学术不端行为在社会上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与新时代新要求很不协调,为世人所诟病。习近平总书记在“3·4”讲话中鲜明提出“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坚持以明德引领风

尚”,要求文化艺术工作者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肩负起“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的重要职责”,承担起“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使命”,“以高远志向、良好品德、高尚情操为社会作出表率”,为国家和民族作出贡献。这一要求振聋发聩、催人警醒,值得我们所有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永远铭记、时刻遵循。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是敲锣打鼓、热热闹闹的事情,而是探求真理、把握规律的事业,不是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名利场,而是正本清源、培根铸魂的大工程。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急功近利,来不得丝毫心浮气躁,必须潜下心来,耐得住寂寞,在学术积累上下功夫,在守正创新上下功夫。“古来圣贤多寂寞”。一切有作为有成就的学术大家,哪个不是经受过长期寂寞的修炼?“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作半句空”,这既是一种精神境界,也是一种学问之道。只有甘于寂寞、静下心来,多下苦功、多练真功,不断增强自己的学术积累和创新功力,才能拿出高水平、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形成自己特有的学术风格和学术影响力。

学术精品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千锤百炼之作。有人向郑板桥请教如何才能写出好文章,郑板桥送了一副对联给他:“删繁就简三秋树,标新立异二月花。”好文章结构要“简”,就像三秋之树一样,删繁就简,令人提纲挈领;立意要“新”,就像二月的花一样,标新立异,令人耳目一新。这可谓是做学问之真谛。鲁迅先生说过,好文章是改出来的,起码要改八遍。反复修改的过程,也就是删繁就简、标新立异的过程,也就是精益求精、守正创新的过程。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应当继承前人这种精益求精求深的治学精神,增强自己的“精品”意识,修炼自己的“力作”追求,扎扎实实下一番删繁就简、标新立异的功夫,绝不可好高骛远、心浮气躁、急功近利!

时代在召唤,人民在期待。让我们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指引下,进一步振奋精神,勤奋努力,立时代之潮头、发思想之先声、扎扎实践之沃土、探学术之真谛,出色履行新时代赋予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责任!

哲学只有融入时代才能充满活力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何中华



今年3月4日,习近平同志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和社会科学界的委员,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者,我对其中的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的要求,感受尤为深刻。

习近平同志要求哲学社会科学要“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哲学乃是时代之镜。黑格尔就说过:“哲学……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在1842年6、7月间写的《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马克思也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因此,“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在马克思看来,“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它“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们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那种曾经用工人的双手建筑起铁路的精神,现在哲学家的头脑中树立哲学体系”。当然,黑格尔哲学是思辨的哲学,它同马克思的哲学在立场上是截然不同的,但这并不妨碍它同样揭示了哲学同时代之间的无法剥离的联系。作为哲学工作者,我们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野出发,准确地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内涵、时空方位、本质特征,以回应新时代的重大关切和学理诉求,为我们从哲学层面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实践提供有益的启示。

马克思当年为什么要创立自己的新哲学,说到底是因为他不满意于旧哲学同时代相脱节的状况。针对德国古典哲学,他批评道:“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马克思之所以能够超越并克服一切旧有的哲学及其缺陷,创立起全新的“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亦即实践的唯物主义,从根本上说就在于这种新哲学在反思中真正把握住了自己的时代,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自我解

构的内在逻辑,并准确地预言了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从而为人的历史解放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正确地筹划了未来的图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具有不竭的生命力,就是因为它能够不断地感应时代脉搏,回应时代质询,昭示时代走向,并在与时代的建设性互动中实现对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建构。

当然,哲学毕竟是以反思的方式切入并把握时代的,所以我们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切近时代的同时,也应该注意避免使切近时代的要求沦为掩饰学术平庸化的借口。我们决不能无视马克思当年在不列颠博物馆所作的艰苦卓绝的思想劳作及其不可替代的意义。在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只有成为自觉的阶级,才能真正担当起自我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作为“被理解和被认识的生成运动”,共产主义也只有变成自觉的事业,其主体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离开了严谨笃实的学术探究这一“武器的批判”活动,从而为无产阶级及整个人类的解放锻造“批判的武器”,就是不可能的。

习近平同志期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解疑释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调查研究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也是党领导人民群众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马克思曾指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恩格斯也强调说:“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这些条件”。离开了实地调查,就无法了解“具体情况”,无法把握“现存条件”,从而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国情。历史充分证明,熟知中国国情,乃是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中国革命最后胜利的重要前提和可靠保障,也是防止和克服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有效解毒剂。毛泽东同志当年就曾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明确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并不仅仅是口头上提倡,而且身体力行,例如在1927年,通过实地调查,写出了像《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样的

马克思主义光辉文献。而教条主义者虽然对马克思主义的条文能够倒背如流,但由于脱离了具体国情,偏离了中国具体实际,结果是差点葬送了中国的革命。教条主义者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而不是扎根于中国大地。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来说,这不过是“死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活的马克思主义”。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其实,中国革命是这样,中国的建设和改革也不例外。这已经为我们长期以来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所反复证明了的。作为哲学工作者,我们不仅要读好专业本本,更要读好中国这部“大书”,而且需要读懂、读熟、读透。这样做出来的学问,才有可能对中国有益,对中华民族有益,对我们这个时代有益。

要做到“着眼群众需要解疑释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哲学工作者就必须具有自觉而清醒的问题意识。真正的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马克思认为:“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这是因为“每一个问题只要它是一个实际的问题,也就能得到答案”。因此,甄别问题真实与否,乃是我们首先必须做的具有前提性的工作。只要是真问题,就一定能够寻找并得到恰当的答案。

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实现中国化,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正确地认识并把握中国国情,从而能够“接地气”,把理论融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在今天的新时代,我们同样需要继续了解人民群众心里究竟想什么、最需要什么、最关注什么、最期待什么,唯其如此才能使哲学成为老百姓真正愿意亲近的智慧,“才能真正‘把学问写在群众心坎里’”,从而成为“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最本真意义上的“解放”。马克思强调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

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理论只有掌握群众,才能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有说服人,才能掌握群众;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而只有抓住事物的根本,理论才能彻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彻底性所在。在马克思看来,只有达到了这种彻底性,才能获得“实践能力的明证”。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就是人的现实生活,它是人的此在性的表征和确证。只有真正以内在的方式介入这种此在性,从而融入人们的现实生活的哲学,才能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也才能具备毛泽东同志当年所期待的那种“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大众化。

“志当存高远”。我们必须时刻警惕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学院化的倾向,避免使之沦为一种“象牙塔”里的事务。经院化的研究这种褊狭的工作,可能是带给研究者以某种乐趣,但这种满足终究是自私的。马克思在其中学作文《青年在职业选择时的考虑》中曾经说过:“我们的使命决不是求得一个最足以炫耀的职业”,因为这样的职业最多使我们所感到的不过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而“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对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这就是马克思的高远志向和抱负,它正是马克思孜孜以求的普罗米修斯式的人格的真实刻画和写照。可以说,马克思用他的一生的奋斗和牺牲证实了这种高尚的人格,为我们后人树立了不朽的榜样。

我们离马克思的这种超凡脱俗,固然有着莫大的距离,但我们应该像司马迁对待孔子所说的那样:“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